■财富话题

负担过重 让越来越多中等收入者成伪中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中等收入者是社会稳定的中坚,是扩大消费的主体。然而,过重负担之下,国内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者非但没有成为“中坚层”,反而成为“夹心层”。同时,低收入群体也在为难以跨入中等收入者行列而焦虑。建设“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任重道远。

北京市外企白领王媛

生活压力大 成了“伪中产”

王媛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是人们眼中标准的“白领”。她月薪上万,每天衣着光鲜地出入高档写字楼,生活体面、滋润。去年初,她“升级”做了妈妈,不仅生活忙乱起来,更要好好考虑家庭整体规划,除了为父母养老,还要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从幼儿园开始就得给孩子找好学校,费用不菲。如果再上辅导班,开销就更大了。”王媛算了算,学龄前就得预备10来万元。王媛是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自然要靠她。王媛的爱人来自农村,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以后也要承担两位老人的养老。

花销这么多,收入够用吗?王媛说,工资是她的主要收入来源,每扣完各种保险、所得税后,拿到手里的有9300元左右。好在2011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了,她每个月少交了500元左右的个人税。

“收入看起来不低,但工资涨速跟不上物价的涨速,而且我们公司工作压力挺大的。每年经过严格的考核评比,只有评级靠前,工资涨幅才能超过10%。”王媛说,去年生完孩子后,有好几个月没工作,收入也少了不少。她觉得自己成了“伪中产”。

说到股票、基金等财产性收入,王媛只能苦笑。2007年,A股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点时,王媛随大流进入资本市场,买股票、买基金。然而,随着A股持续下跌,现在她都没心情去看股票账户了。

“最近打开账户一看,投进的10来万元钱,现在缩水了一半不止。基金除了一只还稍微稳定点外,其他的大约已经亏了20%。”王媛说,“本来还打算给儿子投资点教育基金,现在看来都不太合适。希望以后股市能正常、健康发展,让我们也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哈尔滨药企销售员许亮

岗位在低端 难有高工资

“如果安心干下去,日子也过得去,但年轻人总不想就这么认了。”许亮今年28岁,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为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实现职场跨越,三年时间他换了三份工作。

2008年,许亮从哈尔滨本地一所知名大学的食品工程专业毕业,进入一家食品企业做质量管理工作。“每天化验油脂、酸度、过氧化值,准时上班,准时下班,日子平平淡淡,待遇也平平淡淡的。”

虽说专业对口,许亮仍然觉得每天和瓶瓶罐罐打交道,不是他理想中的职业。一年后,他离开了哈尔滨,跳槽到大庆市的一家乳品企业,从事终端控制系统操作。

“收入略有增加,但每天在生产车间里的工作就是排料、调配,晃来晃去还是老样子,人也学不到新知识,感觉毕业之后没有什么成长。”许亮说,企业对低端生产线的员工几乎没有什么培训,最大的培训项目就是企业ISO认证时进行的岗位培训,“即便拿到企业内部资格认证,如果跳槽,也是根本不顶用。”

“咱干的工作就是最基础的,每个月的工资也不高,就是2000元左右。离家又远,将来生活上还要面对很多实际的问题,还不如回到哈尔滨,至少家里可以照顾我的生活,压力也会小一点。”许亮说。

去年初,许亮舍弃了那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到哈尔滨一家生物制药企业搞销售。“现在的收入差不多每月有3000元,工作虽说辛苦些,每天要跑药店,维护良好的客户关系,但比起以前单调的生活,感觉充实很多,至少每天都能有成长,有积累。”

回顾三年来的职场生活,各种劳动保障无法衔接让许亮很头疼。“换一次单位就要重新办一次,很麻烦。要是各种保障都很健全,就算辞职单干,心里也有底。”

人往高处走,低端的产业里只有低端岗位和低工资。现在,许亮最大的希望就是多积累一些经验,将来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早点进入“中产”行列。

海口市按摩店老板刘荣光

收入不稳定 攒钱不容易

冬日的海口市琼苑路,微风吹拂、绿叶婆娑。街边一个小胡同口,摆着一柱白色灯箱,上面写着:针灸、梅花针、三棱针、拔罐、刮痧。推开房门,老板刘荣光正在给客人按摩。

“按摩一次多少钱?”记者问。

“35元。”

“一天有几位客人?”

“不确定。最多一天来了11位。”刘荣光说着话,手并不停,拍拍打打,非常卖力。

1997年,刘荣光来到琼苑路,租了一个80平方米门面房,雇用七八个按摩工。当时,每个月能挣上万元。后来,因房屋拆迁,他只好再找新地方。几经换房,生意变得越来越清淡。

“做个体生意不容易,客人少的时候就只能在屋子里干等。平均算下来,一个月能赚7000多元吧。”刘荣光说,生意很不稳定,这也让他不敢多聘用帮手,到现在还只是一个人做。

“按理说挣得不少了,可仍觉得手头紧。”刘荣光算了一笔账,每月房租900元、水电费350元,按摩床一次性投入5000多元,一套理疗仪就得1万多元。此外,还要购买水盆、毛巾、床单、按摩精油等各种物品,都得花钱。

生活上的支出也不少。刘荣光说,自己每月饭费800元,还要给父母养老金1000元,老婆孩子的租房费每月1000元、生活费每月1000元,这么一算下来,每月剩余寥寥无几。现在父母年事已高,万一有个大病小灾,找钱治疗都头疼。

说到买房子,刘荣光直摇头:“按现在的房价,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大概需要八九十万元,根本买不起。”刘荣光说,都说宏观调控政策正发挥作用,不少地方的房价下降了,但什么时候能让我们这种收入的人买得起房?

刘荣光说,海口市鼓励外来务工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但很多人对此还有顾虑。如果工作流动性比较大,收入又不稳定,这样漂来漂去,哪有希望成为“中等收入者”?

莱芜市民营企业文员赵雯

有了公平竞争 才能向上流动

“现在生活还算平稳,就是工资太少。”谈起自己的近况,在山东省莱芜市一家民营企业做文员的赵雯说,每月能拿1000多元,这已经是她大学毕业后换的第三份工作了。

5年前,赵雯刚考上山东青岛市一所大学,这在她们那个小村庄也算一件大事,邻居、亲戚纷纷夸她有出息。赵雯对未来也充满憧憬和向往,期待学有所成后找到一份好工作,好好报答父母。

大学四年很快过去了,找工作却并不容易。赵雯尝试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山东省公务员考试,未能通过;参加省城一家报社招聘,未能通过;之后,她进入当地一家私营企业,但干了不长时间,赵雯觉得工资太低、没有发展前途,辞职了。半年多的时间里,她换了好几家企业。

读书,还能出人头地吗?

赵雯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找工作不顺利,或许是自己能力不行,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她的一位大学同学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事业单位工作,连笔试都没参加,简单搞了个面试就过关了。为什么这么轻松?“听说是家里有关系,早就做工作了。”赵雯说,这样的事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现在大学生要找一个好工作,自然需要多努力,但努力是否就一定有用?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恢复高考后,一大批寒门子弟曾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让许多家长抱着一个信念: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然而,近年来这种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决定大学生就业状况的往往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这加剧了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难度。

“以后,如果能有机会换个更好的工作,我还是想试试。”赵雯说,她不会怨天尤人,以后会更加积极提高自身能力。但她也希望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这样才更有可能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成为梦想里的中等收入者。

(摘自《人民网》文/欧阳洁 袁泉 马跃峰 崔 鹏)

■财富故事

奇案迷踪 堪比大片

蹊跷车祸 边城豪门生死劫(下)

失去了婚姻,失去了三个子女,现在又与唯一的亲生女儿王艳丽交恶,沉浸在悲伤与绝望中的刘康侠,无法解开车祸背后的谜团,更无法得知等待她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与结局;而边城格尔木亿万富翁王荣斌身后留下的家业,在两名继承人死于车祸后,最终将如何分割,也在未知之数。

刘康侠印象最深的,是前夫王荣斌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如果孩子是被人谋杀的,散尽家产也要找到这个人(凶手)。

王宁宁保单疑云

刘康侠的怀疑来自于一串串的巧合。

与乔传领驾驶的桑塔纳3000相撞的星光牌重型自卸车,挂靠在安徽宿州市东方汽车有限公司,车主系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人蒋梁宾。公安交通管理信息查询系统的信息显示,此车购置于2006年4月3日,2007年4月30日之后,就再未做过年检,保险也在2007年4月2日终止。

王荣斌后来娶的妻子胡桂平是安徽宿州萧县人,而萧县与淮北交界,淮北辖区只有濉溪一个县,两个县之间相隔很近,而星光牌自卸车车主蒋梁宾,正是濉溪县人。

如果仅仅只有这些,刘康侠并不会怀疑车祸背后有阴谋。据她所知,车祸前几天,胡桂平一个在王荣斌公司烧锅炉的弟弟,突然从格尔木消失,事发后方才回到格尔木。

在时代周报记者与律师陈令明的协助下,刘康侠在一家保险公司发现了一份以王宁宁的名义签订的保险合同。这份“平安智盈人生终身寿险”的保险合同,签于2010年10月6日,保单业务员名为胡晓侠。陈令明说,根据保险合同,若被保险人因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额会翻倍;而王宁宁在保险单签署2个多月后即车祸身亡。

2011年11月14日,时代周报记者约见胡晓侠,试图了解当初与王宁宁签下保险合同时的情况。起初,胡晓侠满口应承,并约好在当日下午2时30分到3点见面。当日下午,时代周报记者再次致电胡晓侠时,她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出来了。

时代周报记者在电话中询问胡晓侠,王宁宁的保险合同是不是他本人签的,胡晓侠说当然是,但她不愿意详述签合同的场合。当被问到是哪里人时,胡晓侠的声音马上提得很高:“我有必要回答你吗?”经时代周报记者多方调查证实,胡晓侠系胡桂平之妹。

在西宁,时代周报记者见到王宁宁的同学。熟悉他的同学见到保险合同上的王宁宁的签名后,非常很肯定地说:“这不是王宁宁的字!”

而刘康侠也找到王宁宁大学时的课堂笔记,经过多人比对鉴别,其笔迹与保险合同上的签名并不一致。王宁宁大学时的班主任,向时代周报记者提供了一份王宁宁毕业时留在学校的最后两张签名表格。多名公安部门资深刑事专家在比对鉴别后均表示,王宁宁留在学校的签名,与保险合同上的签名特征不相同。

王艳丽的蹊跷角色

刘康侠想起2010年12月30日车祸当晚9点多,她突然接到三女儿王艳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电话里,王艳丽告诉母亲刘康侠,王捷捷和王宁宁出车祸了,一个重伤,一个轻伤,要母亲带1万元从上海赶去格尔木。至于王艳丽为什么会出现在上海,她本人的解释是,从昆明去格尔木,必须经过上海。

刘康侠所不知道的是,女儿王艳丽若要从昆明经上海前往格尔木,完全是南辕北辙。刘康侠说,王艳丽再三告诉她,只许她一个人去。再三商量后,王艳丽才允许母亲和一个舅舅同行。刘康侠清楚记得她在交警大队事故组见到现场并无明显的车祸痕迹,桑塔纳车只是在右前方有一块像是被刀切掉的痕迹。而一同死于这场车祸的死者严忠的父亲,在描述他在车祸现场见到的桑塔纳轿车损伤情况时,也用了“刀切一样”的字眼。

刘康侠至今未见到儿子王宁宁和女儿王捷捷的遗物,它们早已被周元华派亿佳公司一个名叫周荣的人取走。刘康侠说,王捷捷曾告诉她,她存了5万块钱,要带外婆出去旅游。刘康侠说,周元华掌管着王宁宁与王捷捷的遗物及遗产。更让她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亲生女儿王艳丽曾在多个场合辱骂她,并且要动手打她。

蹊跷的事情远远不止这些,时代周报记者前往金辉矿业了解王捷捷工伤赔偿情况时,该公司提供的文件显示,王捷捷的赔偿金早已被王艳丽取走。

在青海省海西州社保局,时代周报记者查询王捷捷工伤赔偿情况时,海西州社保局工作人员经查询后答复,此事系金辉矿业归属地都兰县办理,他们只负责核对金额审批。而海西州社保局工作人员在向都兰县社保局了解相关事宜后,直斥都兰县社保局工作人员违规操作。

原来,按照规定,工伤赔偿金应发放到单位,由单位转发给工伤遇难者家属,但都兰县社保局却直接将钱给了王艳丽。在金辉矿业提供的文件上,领取赔偿金的王艳丽,同时也是这份文件的“制表人”;而都兰县社保局直接给王艳丽发放赔偿金的原因为,“熟人带去的”。

事发后,王艳丽一直试图将王宁宁和王捷捷的赔偿金拿到手。在格尔木市人民法院,一刑庭法官告诉王艳丽,按照法律规定,姐姐王捷捷和弟弟王宁宁的赔偿金,确实有一部分是应该给王荣斌,但王荣斌已死,因此赔偿金大部分要支付给刘康侠。这名法官劝王艳丽不要争,但王艳丽向法官表示:钱可以给我妈,但是必须由我来保管,她需要钱的时候我再给她。

格尔木市人民法院立案庭一武姓庭长,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对于涉及民事纠纷的部分,王艳丽完全有资格领取社保局的工伤赔偿金,对于刘康侠要以物权转移为支点打官司,她不支持。

武称,王艳丽有王荣斌的授权书,可以取走王捷捷的赔偿金,要打官司也是按照继承权打官司,王荣斌死了,王荣斌的后妻、王荣斌和后妻的女儿,以及刘康侠、王艳丽,都是这笔赔偿金的合法继承人。不过,都兰县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贾惠涛否认了王艳丽在领取赔偿金时有王荣斌的授权书。2011年12月6日,都兰县社保局工作人员表示,此事已上报省有关部门,拟按照新的赔偿标准向刘康侠发放赔偿金。

王荣斌最后一个电话

当时代周报记者试图采访王艳丽时,她均以“这是我们家里的事情,关你们报社什么事情”为由拒绝。王宁宁的一位大学老师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王宁宁在校期间比较低调,很少提及家里的事情,她是在王宁宁毕业时才知道其父是个富人。王宁宁从不愿意提起他父亲和家里的事情,一旦说起,就会很厌恶地说“我爸爸和小妈怎么怎么地”。王宁宁的同学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王宁宁出事后,同学们曾找到王荣斌在西宁的家里探望,但始终未曾敲开王家的大门。王荣斌在癌症后期,一直住在西宁。

刘康侠说,车祸后不久,她曾向格尔木市公安局报案,一位局领导接待了她,但未立案。

长女早年死于车祸,次女与唯一的儿子刚成年不久即在离奇的车祸中丧生,刘康侠终日以泪洗面。她在格尔木期间的住处离子女墓地有30里的路程。悲伤的夜里,思念死去的儿女的她,经常一路号哭着走到墓地。失去了三个儿女的刘康侠,如今仅剩的一点积蓄,也被一个声称能够帮她伸冤的人骗走了。走投无路的她念念不忘的是,前夫王荣斌打给她的最后一个电话。

事故后不久,在格尔木一个小旅馆内,周元华拨通了王荣斌的电话后,将手机递给了刘康侠。刘康侠说,电话中,王荣斌告诉她,上半辈子对不起她,下半辈子一定想办法补偿她。刘康侠说,她和王荣斌通电话时,在场的有王荣斌老家3名亲友、周元华和她的弟弟妹妹。

刘康侠印象最深的,是王荣斌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如果孩子是被人谋杀的,散尽家产也要找到这个人(凶手)。

刘康侠说,说完这句话,通话就结束了,王的手机似乎被人夺去。直到2011年11月15日,王荣斌在死于徐州第四人民医院时,他们都没能够再联系上。在此期间,对于王荣斌究竟是死是活,在什么地方,她都无从知晓。

刘康英留心记下了通话时王荣斌所用的手机号码,并记在自己手机上。让她再次心生疑虑的是,这个神秘的手机号码,后来出现在王宁宁那份神秘的保单上,在这份保单里,联系电话和首选回访电话均为此号。而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得知,这一号码还出现在王宁宁大学时写的家长联系电话上,而手机的户主竟然是她的姐姐王艳丽。目前,这个手机号码还剩3000多元的话费,但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2011年11月15日上午,在格尔木市人民法院立案庭,武姓庭长拒绝刘康侠以物权转移为支点的立案申请。当日下午,武庭长得知时代周报记者在采访此事后,态度立马转变,向刘康侠和她的律师表示,可以立案。但在连日的调查中,嗅到危险气息的刘康侠已在律师的伴随下离开了格尔木这个伤心之地。

(全文完)

(摘自《时代周报》文/宋阳标)